

YINGYU KOUYI

JIAOXUE FANGFA YANJIU

英语口语译 教学方法研究

■ 王超 董良和 张林影 唐琛 编著

黑龙江
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



英语口语
教学方法研究

ISBN 978-7-5389-1700-0



9 787538 917000 >

定价：18.50元

YINGYU KOUYI

JIAOXUE FANGFA YANJIU

英语口语 教学方法研究

■ 王超 董良和 张林影 唐琛 / 编著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语口语教学方法研究 / 王超等编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389-1700-0

I. ①英… II. ①王… III. ①英语—口译—教学法—
研究 IV. ①H31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9521 号

书 名/ 英语口语教学方法研究
编 著 者/ 王 超 董良和 张林影 唐 琛
责任编辑/ 朱英华
责任校对/ 徐平松
封面设计/ 李光吉
出版发行/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发行电话/ 0451-57364224
电子信箱/ hcxmz@126.com
印 刷/ 牡丹江邮电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9-1700-0
定 价/ 18.50元

前 言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和国际会议、商务洽谈、外事接待、联络陪同、国际学术等交流活动的日益增多,社会和市场对应用型翻译人才特别是口译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而目前国内,无论是高校本科阶段的口译教学还是职业口译市场上的口译教学,无论是非语言专业的口译技能训练还是作为翻译专业的口译教学,效果都不尽理想,培养的人才也不能适应社会和市场的要求,制约着应用型口译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随着职业口译市场和多样的译事活动对专业化口译人才需求的加大,口译技能的培养早已不能仅仅通过课堂教学来实现,口译教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体系的建立亟待探索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为外语专业的本科口译教学、翻译专业本科口译教学、翻译方向研究生层次的口译理论与实践、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口译教学、非外语专业的口译选修课和各类培训机构开设的口译培训班的教学提供系统、专业的理论指导。

尽管从 20 世纪末开始至今经历了近 30 年的发展,我国高校和各种层次的培训机构开设的口译课程无论从教学水平还是质量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教学体现出一种实用主义有余而科学性不足的倾向,主要体现在:对口译教学理论研究的重视不足;研究方法主要借鉴和挪用西方口译学界的研究成果,要想展开中西方在口译研究领域中等对话还有待时日;缺少对口译活动所发生的语境进行的研究,因此对口译类型的具体区分还不够详尽,导致教学方和学习方对各类口译的异同、适用范围和对译员的具体要求并不清楚;教学内容务实、刻板,主要集中在语言水平的提高、百科知识的丰富和口译技巧的训练方面。因此,口译只是作为课程的口译,而不是能力培养的口译,得到重视的仅仅

是教学目标的实现，而不是口译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口译员可能转换语符传达了意思，但却没有实现成功地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因此，当前口译教学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目标、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等的设计和实施都存在着种种局限，亟待口译学界从认识层面、学科体系建构层面、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梳理和建立体系，也需要口译教学方在教学实践环节中突出口译作为一种复杂的跨文化、跨语境的社会行为本质，指导教学内容的编排、教学手段的更新和教学方法的变革等。

本书旨在通过探讨口译活动的客观规律和本质，比较东西方口译研究学界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手段，以及现有的口译教学模式，区分各类交际语境中的口译活动类型，描述译员在口译活动中的信息加工过程，调动使用各种能力和发挥主体性意识来促成不同语言之间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为建立一种口译教学体系、提高课堂内的口译教学效果和口译实践中的交际效果进行探索，为实现口译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满足职业口译市场需求的口译人员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一定程度上，笔者编著本书是建立在对口译教学和口译实践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之上，是在口译教学理论方面进行的尝试性的探讨，希望书中的拙见和粗浅研究能够为正在蹒跚的国内口译教学理论研究、口译员培养和高校各层次口译教学的顺利开展略尽绵薄之力，不求为金玉良言，但求为抛砖引玉，为众学者今后在相关领域里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和多层次的探讨提供一些思路 and 参考，并以此求教于专家同仁。书中难免会有不足之处，希望广大专家、学者及同仁提出宝贵意见。

本书由王超、董良和、张林影、唐琛编著。具体分工如下：王超负责前言、第三章的撰写，7万字；董良和负责第一章撰写，6万字；张林影负责第四章、第五章的撰写，5.7万字；唐琛负责第一章、第六章、结语的撰写，5.3万字，同时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

编著者

2010年10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中国口译教学现状	1
第一节 西方口译理论的研究状况	5
第二节 中国口译理论的研究现状	17
第三节 中国口译理论研究的阶段特征和存在的问题	26
第四节 中国跨学科口译理论研究状况	34
第五节 中国口译教学存在的问题	39
第六节 口译教学理论框架	49
第二章 口译教学本体研究	55
第一节 口译的概念、性质与类型	55
第二节 口译的教学目标	58
第三节 口译的教学过程分析	63
第四节 口译与笔译的区别及口译教学对口译特点的体现	74
第五节 口译教学与口语教学的区别	80
第六节 认知能力与口译	86
第三章 口译教学实践论研究	93
第一节 大学本科口译教学的定位及教学	93
第二节 以技能为主的口译训练模式	105
第三节 案例教学法在口译教学中的运用	107
第四节 模拟口译实践设计、监控与实施	112
第五节 交替传译口译教学	114
第六节 交替传译训练——口译笔记训练	120
第七节 交替传译训练——预测能力培养	124
第八节 同声传译教学	130
第九节 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的区别	138

第十节	口译过程和口译技能训练	147
第十一节	口译训练细节操作	153
第四章	针对不同教学对象的口译教学研究	160
第一节	英语专业口译教学	160
第二节	非英语专业口译教学	167
第五章	口译教学方法论研究	173
第一节	释意派理论对口译研究与口译教学的启示	173
第二节	关联理论与口译教学	178
第三节	跨文化意识与口译教学	183
第四节	影响口译的文化差异与跨文化意识培养的因素和对策	188
第五节	口译应变能力	194
第六章	网络多媒体环境下的口译教学模式	201
第一节	多媒体与口译教学	201
第二节	建构主义理论与口译多媒体教学	205
参考文献		210
结束语		218
编著者简介		221

第一章 中国口译教学现状

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口译作为辅助跨文化交际的工具,作为最直接、最便捷、最普遍的口头交际手段被广泛运用在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商贸往来的各种场合之中,如:国际会议、外交外事活动、国际贸易、商贸谈判、记者招待会、体育比赛解说、旅游访问、学术讲座、技术输出、国际法庭审判、海外投资等活动,都需要通过口译员来协助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达到沟通交流的目的。如果说,没有“陈说内外之言”、“能达异方之志”的译员的努力,人类跨越民族、种族、国界和地区以及跨越历史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交流将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中国,尤其是在成功入世和举办奥运会、世博会以来,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加速增长,对外宣传加强,中国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中国需要走向世界,世界期待了解中国。因此,社会各行业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对口译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与机遇,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对外交流与合作,21 世纪的中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大批优秀的口译人才。

从 1978 年开始,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就在全中国率先为本科学生开设了“英语口译课”,并编辑出版了专门的口译教材。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各高校陆续开设口译课程,外语专业、旅游专业、国贸专业都开有口译课。为了顺应时代的要求,高等教育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于 2000 年 5 月将口译课列为中国高校英语专业必修课,有些学校早已开始在研究生阶段培养专业口译人才,以满足社会上各类译事活动对应用型翻译人才的需求,甚至非外语专业的大学英语教学都在尝试着把口译技能训练作为培养既具备专业知识又具备外语综合语言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教学内容之一。社会上各类口译资格证培训机构更是遍地开花,以迅猛之势开发外语培训的新市场、创造新的商业

效益。但随着国际社会的多样性的译事活动对高水平、专业化口译人才的需求,口译能力既不是外语专业必修课和非外语专业选修课的教学目标所能实现的,也不是外语培训机构的几节速成突击课程所能培养出来的能力。口译教学应该朝着理论研究和体系建立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从事口译教学或培训的个体和组织、口译的教学方和学习方对所从事的口译教学和本质的规律进行发掘探索,并针对口译活动发生的不同社会文化语境分析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在这一跨文化交际中所发挥的作用;明确“口译教学”在实现不同层次的口译人才培养目标的针对性,是作为“口译专业”的教学,还是作为外语专业必修课的教学,或者是作为外语专业中“翻译”方向的教学等,从而选择教学方法和手段,确定教学内容,培养具备多种能力的合格口译员;确立详尽完善的口译质量效果评估体系,对口译教学和学习过程有效地监控,提供有益的反馈。

尽管口译教学经历了近 30 年的实践和探索,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教学效果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教学理论研究也呈现出多维度、跨学科的态势,但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对口译教学目标的认识缺乏针对性和本源分析。高校外语专业的口译教学被普遍看做是本科阶段的技能培养,教口译要么是生搬照抄以往的口译教学过程和方法,训练方式刻板机械,训练内容过时、牵强附会;要么就是简单套用传统的语言学理论、学习策略论和二语习得等理论,理论性强但操作性差,学生因理解理论有困难而产生畏难情绪,学习不能持之以恒,或是各种方法层出不穷,变换多样,学生接应不暇,严重影响学习兴趣和效果。社会上的各类口译培训机构更是以速成、实用和应试为目的,内容上侧重套话、套语等表达方式的扩充,训练方法就是进行简单重复。试想,仅凭扩大词汇量和表达方式的重复机械训练怎能培养出语言能力强、知识全面、口译技能扎实、擅长人际交往和富于应变的口译人才呢?二是口译教学队伍层次、能力、水平差异较大。据不完全了解,目前任教的口译教师大体分为四种:1. 本人未接受过正式的口译培训,但有机会从事口译实务,积累了丰富的口译实战经验,后转型从事口译教学,通过学习和摸索,探索出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这

主要是指我国国门打开后在外交、外事、文化、经济的交往中因从事口译工作而成长起来的较早一批口译教员。2. 自身接受过较为系统的口译课程培训,有些甚至在国外高校获得了翻译专业或翻译方向的学位或证书,同时也具备相当的口译实践经验。这部分教员大部分为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教师。3. 参加过某种形式的口译培训,如口译培训班、口译课程、口译工作坊、系列讲座或岗前培训等,但缺乏足够的真实的口译实践的磨练。4. 参与口译实践机会不多,也并未接受过任何正式的口译培训,只是应教学任务要求或是个人兴趣,硬着头皮担纲教学,“开弓没有回头箭”,边学边教。后两种情形中的年轻教师居多。在这样一支口译教学队伍中,有中坚力量也有实力不足的群体。口译的实践性和技能性都很强,这也就要求从事口译教学的教师在教学和实践方面都具备较丰富的经验,否则对于第三种和第四种教员,不难推测,由于不了解口译教学特点和内容,不清楚口译活动规律和特质,不能区分各种口译类型的异同之处,这些“生手”口译教员自身都不可能对各种口译技能运用自如,也不具备灵活处理不同场景中的突发情况,更不具备驾驭复杂的跨文化语境下的人际语际关系的经验与能力,何谈能够在虚拟的口译课堂里向学生进行卓有成效的传道授业?而我国现有的口译教师队伍就存在这样一种良莠不齐、水平能力差异巨大的现状,因此教师队伍的能力和素质提高亟待开展。三是口译教学体系的建立离不开教学理论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但我国口译理论研究水平仍有待于提高。我国的口译教学研究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经历了套用外国语言学理论试点教学、应用理论指导教学、结合理论改革教学等阶段,虽然外国语言学理论和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从引进、消化和应用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和有益的启示,但是我国对口译的专业研究和口译教学的研究成果仍很有限,已有的研究著述偏重对口译教学方法的探讨、口译技巧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借鉴前沿科学的最新成果对口译进行学理性探究的尚不多见。研究手段传统单一,缺少从微观角度对口译活动进行细致剖析,如:对各种口译类型进行详尽的区别和特质分析;对口译员在不同语境下的主体性意识的发挥情况的研究;口译研究“理论热点”切换不

断，而对本体研究，即系统地分析口译自身规律、特点和我国口译学习者学习特点和规律的研究重视不够，投入不够，也鲜有突破性进展；或是对“盲点”和“冷门”的研究更是缺少关注，如：使用现代技术的“远程口译”，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间的传译，有声汉语与中国手语之间的传译，中国手语与国外手语之间的传译，医学与法律、法庭等专业性较强的口译研究成果极少，与国外在这方面有卓著研究成果的专家及学者至今几乎没有沟通；关于口译学教学的实证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试想没有经过严谨客观的数据收集、完整的数据转写、严密的数据分析，所得出的研究结果的说服力和应用价值势必有限，更不能对建立系统有效的符合中国学习者特色的口译教学做出有益的启示。

因此，对口译教学理论进行历时性梳理和整体考察的呼声此起彼伏，建构多维度、多层次和全方位的理论和教学体系势在必行，对现有的各类口译教学模式的改革更是呼之欲出。我国的口译教学实践应是符合我国外语教学规律和学习者学习特点的教学，是健全完善的口译研究理论和口译教学理论指导下的积极实践。国外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固然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但是中国的口译教学实践更需要符合特点和特质的理论指导。这是因为，首先，我们面对的口译教学的对象不同。我国的口译学习者既不同于西方二语习得的语言学习者，又因学习者自身的个体需求差异而不同。在汉语的语言环境中，母语特殊的语言结构特点和母语文化背景对思维模式、信息处理方式及中介语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这大大不同于西方二语学习者的信息加工方式，并且在同一母语和文化背景下，服务于不同的交际场合的口译需求也对教学提出了更为细致的要求。其次，语言教学的环境不同。培养口译能力所需的目标语语料和文化的输入数量、输入质量以及真实感都受到语言环境、教师、教学方法、教学资源等因素的影响。第三，对外语学习目的的看法与其他国家的外语学习者不同。长期以来，外语教学的评估方式一直是书面考试，而不是对语言应用能力的测评，因此外语教师和学生都普遍认为应从培养读、写能力入手为基础，等到基础牢靠了再加强听、说、译的能力，学习者从心理上认为只有对语言要素掌握到了

十分的把握才能张嘴说和提笔写。这种小心谨慎甚至有些诚惶诚恐的心态使得外语学习者的学习过程沉重而又艰涩,形成“不敢说,说了容易错,越错越不敢说”的局面。因此,强调分析我国口译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和规律,形成符合我国外语教学特点的口译教学理论完全是应该的和必要的。

2006年,教育部批准了国内三所高校试办翻译专业,开设了招收翻译专业本科生的试点,设立翻译课程模块或课程群,强调大量的口笔译技能训练;2007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设置旨在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口笔译人才”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开设各种口笔译课程。这些学制培养的设立和学科体系的逐步建立实际上也是通过试办院校探索专业化、应用型翻译人才的培养,明确与传统外语教学中的翻译教学的区别,定位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改革教学方式、设计教学方法、选择教学手段、提高师资队伍水平等等,形成系统的有中国特色的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和研究理论及方法,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化复合型口译人才。

第一节 西方口译理论的研究状况

人们常说,翻译作为一项以语言为媒介的人类思想文化的交流行为,一项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的古老活动,其悠久历史几乎与人类自身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而这一陈述被认为首先应当指向作为翻译行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口译活动。公元前3世纪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七十子希腊文本》标志着有文字记录的笔译作品在西方问世,中国东汉时期安世开展的大规模佛经翻译也意味着中国的笔译活动也有了将近两千多年的历史。而口译活动更是先于书面文字产生之前,为当时语言不通的部落氏族之间因战争、物物交换、生产、宗教祭祀、异族通婚等事件必须进行的跨部落、跨语际、跨地域交往而极尽辅佐之力,夹杂着大量手势和其他表达方式的非正式口译活动早已出现,各部落

虽“语言不通，嗜欲不同”，但有了“陈说内外之言”、“能达异方之志”的译员的努力，往来和交流成为可能，皇权接受域外使节的朝贡，佛教教义广泛传播，扩张疆域霸权成为可能，可以说若没有口译（当然也包括笔译）人员的共同努力，人类跨越民族、种族、国界和地区以及跨越历史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交流将成为“不可完成的任务”。如果说人类发展与进步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卷帙浩繁、包括口笔译活动在内的翻译史似乎并不为过。因此，如此之久远的历史势必为口译实践创造频繁的机会，而这种实践的活跃也必然推动口译研究的逐步开展和深入。

然而，尽管口译活动有着远早于笔译活动的悠久历史，作为翻译学分支的口译研究却远远滞后于笔译研究。鲍刚教授的《口译理论概述》（1998）是我国口译史上的第一部口译专著，在著述中他曾感叹：“在译学领域，最难作出系统研究的恐怕就是口译了，它的科研难度远远高于笔译。因为，尽管口译与笔译在本质上相同，但两者特点仍有区别：笔译因落在可长久保留的纸张等语言传播载体上，故便于研究人员考察；口译则因其工作时的言语均附着于转瞬即逝的语音声波载体，从而难以在历史上留下大量的直观资料供后人开发、研究。甚至就连它的存在，也往往依据笔译对口译的记载而间接予以证实。这种情况一直到录音设备发明之后才有所改善。”口译和笔译研究呈现冰火两重天的尴尬局面主要源自四个方面：第一，口译活动自身的特点制约着口译研究的发展。口译时使用的语言主要依赖于以声波为载体的语音形式，具有转瞬即逝性，在现代音像设备发明以前，难以留下完整准确的口译译文资料供学者日后研究。口译对有声语言的研究况且如此，更何谈体态语、类语言和副语言等其他辅助跨语际交际的非语言现象能够被记录在案，用于研究。第二，口译活动的特点是即时性和即席性强，译语生成迅速，译语发布具有“唯一性”的特点，译员不可能像译者（为了区别称谓，书中用“译者”表示从事笔译工作的人员）那样可以为了“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而往往要面对“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窘迫局面。为了满足双方交际的目的，译语往往会出现松散、平实、模糊、

冗余或简约的口语体特征，难以呈现文学语言的诗学特征、艺术水准和美学价值，更不及文学作品的译本那样能够给读者提供解读、想象和阐释的空间，因此对口译语言的研究也就很难像对翻译文学中的语言研究那样深入细致。第三，口译活动的外部环境也不利于口译研究的迅速开展。一方面，由于口译行为的现场性和瞬时性，使得参与口译交际活动的人们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只重视整体的译语语义和最终的交际效果，对口译过程本身和各种语言与非语言细节关注不够，对影响口译过程和结果的社会文化语境因素多有忽视；另一方面，在许多国家，译员自古以来地位低下，角色卑微，人们对译员角色多重性、主体性和能动作用多有疏忽，译员整体被边缘化。如果说在作者、文本中心时代的笔译译者被置于从属、次等的地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承认是不争的事实的话，那么从古至今，无数译员的工作更是没有留下“白纸黑字”的印记而被人忘却。第四，口译研究在很长时期里并没有得到同属翻译学范畴的笔译研究者的实质性关注与支持。对从事笔译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他们或许认为口译行为无关痛痒，或许认为口译与笔译差别很大，脉络繁杂，不易梳理体系。笔译界有建树的理论曾试图与口译研究相联系。但在实际研究活动中，还是最终有意或无意地被遗忘在角落，成为被边缘化的对象。

需要承认的是，口译研究和笔译研究本应是翻译学母体下的兄弟姐妹，广大译界学者应当改变两者形同陌路、遮蔽敷衍的局面。同时，学者们也逐渐认识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根本层面上，有关笔译的基础性理论和洞见是可以为口译研究所借鉴的，而翻译学也可借口译研究的深入使自己的理论根基得以进一步充实。

澄清了认识，20世纪50年代西方翻译界开始逐渐提升了对口译研究的重视，以出现了一批以口译经验总结与口译规范介绍为主要内容的著作，标志着西方口译研究的正式开始（Pochhacker, 2004）。通过对西方口译研究进行历时性的梳理发现，其研究的对象始于会议口译研究，因为会议口译是最早得到职业化发展的口译类型，它的发展早于也快于其他类型的口译研究。另外，西方口译研

究注重针对不同口译场合的区别展开研究,以会议口译的研究最为系统,也关注司法审判、医疗救治、教育服务等公共服务性的社区口译和联络口译等类型,取得了一系列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黑尔,2007;梅森,1999)。现任欧洲翻译研究学会主席、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会员的法国巴黎高等翻译学校的吉尔教授在《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中将西方会议传译研究50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划为四个明显的阶段,主要围绕五大研究主题,产生了四种很有影响的研究视角以及多个口译研究中心。

一、西方口译研究的阶段

(一)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早期心得总结阶段”(the Pre-research Period),主要是在日内瓦和布鲁塞尔工作的第一批译员和口译培训者对个人实践经验的思考和总结,对口译行为及译员的工作环境进行观察和分析。探讨的问题包括对译员的语言 and 知识方面的要求、译员的职业素质、译员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意外情况的处理、口译笔记方法以及客户的要求等因素对译语产生的影响等等。这一阶段的研究理论性不强,不过这期间瑞士人让·艾赫贝尔(Jean Herbert)于1952年出版的《口译须知》(Interpreter's Handbook)是世界上第一本有关口译的著述。这本手册介绍了口译的各种技巧和对译员的要求,被口译初学者视为较为实用的学习参考资料,是学习口译之初的必读之物,并且该书还具有一定的理论前瞻性。另外一本由罗兹恩(Rozen)1956年撰写的《交替传译中的笔记》一书阐述的交替传译笔记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至今仍得到口译学界和学习者的广泛认同。

(二)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口译研究进入“实验心理学研究阶段”(the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Period)。主要是一些认知心理学家、心理语言学家和神经心理学家利用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领域的理论框架研究口译的认知问题,对口译过程尤其是同声传译过程提出了一些假想,并分析了原语、噪音、发言速度、原语和译语两股语流的时间差(Ear-Voice Span,即EVS)等变量对口译效果的影响及译员常采用的对策等。这一阶段的研究已经呈现出跨学科,

并向相邻学科借鉴的倾向，然而研究重点仅侧重口译的认知和心智过程，没有意识到口译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仅仅由讲话人单方面的话语意义和信息传达决定，译员所承担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角色对跨语境的交流成败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口译活动绝不是发生在实验室和社会真空里的孤立行为，研究结论更是跟语言教学理论脱节甚远，对提高口译教学质量推动作用不大。

（三）第三阶段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到 80 年代中期的“从业人员研究阶段”（the Practitioners' Period），以口译从业人员（其中大多为兼职口译教师）进行理论研究为主，创造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最有代表性的理论为巴黎高等翻译学校（ESIT）的释意派理论（Theory of Sence, or Interpretive theory），是由两任校长塞莱斯科维奇（Danica Seleskovitch）和勒代雷（Marianne Lederer）创立的。它强调口译以意义为中心，而不是字词和语言结构的对译，把口译视作一个动态交际过程，试图解剖口译的意义传递现象。释意论曾一度成为口译界的主导性理论，在口译技能训练中至今仍有积极的作用。但这一阶段的研究以理论研究和文献研究为主，论断是非实证性的推测，而且释意理论与其他理论学派之间缺乏交流，研究显得较为孤立，应用范围不广。

（四）第四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开始的“新发展阶段”（the Renewal Period），以 1986 年在意大利的特里思特大学（Tieste Universitaria）举办的一次重要的口译会议为转折点，口译研究从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新一代的口译学者开始质疑释意派理论所假设的理想化的口译模式，呼吁走出纯语言学的狭小圈子，提倡更为科学的、更具跨学科性质的口译研究范式。口译界结束了多年来的封闭孤立状态，与各学派之间开始广泛深入地交流，充分借鉴其他学科和前沿学科的研究成果，实证研究也受到一定的重视，口译研究进入更具科学性和跨学科性的研究阶段。吉尔教授借用认知科学理论创建的同声传译和交传的“任务处理模式”（the Effort Models）就是这一阶段广为推崇的成果。

总之，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一